



ZHEJIANG

浙江改革开放研究书系

ZHEJIANG GAIGE KAI FANG
YAN JIU SHU XI

文化与浙江区域 经济发展

祁茗田 陈立旭 等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改革开放研究书系

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

祁茗田 陈立旭等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祁茗田等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8
(浙江改革开放研究书系)
ISBN 7-213-02225-3

I.文… II.祁… III.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研究-浙江省 IV.G1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9228 号

浙江改革开放研究书系

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

祁茗田 陈立旭等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张宪章
封面设计 王义钢
责任校对 戴文英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杭州翠柏路 7 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20 万 插 页 2
印 数 1-1000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225-3/G·615
定 价 13.5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绪 论

弘扬浙江文化精神 再造新的辉煌

本书试图从浙江近 20 多年经济迅速发展的基本事实出发,揭示浙江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文化动因,以期把人们对文化功能的认识提升到更加自觉的高度,这是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一、值得探索的“浙江现象”

在世纪之交,浙江已经从 20 多年前的一个资源小省,无可争辩地作为经济大省跻身于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这种被称为“浙江现象”的巨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于是,巨变的奥妙在哪里,便成为研究者竞相关注的课题。

正确的政治导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作为国家政策的主导,显示出令人惊叹的巨大作用,迅速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可以说,没有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浙江的今天。但是党的政策是普照全中国的阳光,浙江并无“偏得”,何以浙江较大多数省份发展更快呢?这说明,在政策之外,必定另有原因。

浙江自晋室南渡,特别是唐宋以来,以至明清,逐渐成为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鱼米之乡、文物之邦。历史留下的较好的经济、文化基础自然有助于今天的发展。这一点不能否认,但具有类似条件

的也并非浙江一地。

地理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浙江地处东部沿海,和其他沿海省份一样,信息灵通,交通便捷,经济发展较快。应当承认,和中西部省份相比,浙江是有一定的区位优势。但是,若与沿海其他某些省相比,浙江优势却是“略逊一筹”。广东,地近港澳;福建,同其他省市相比,与台湾在历史渊源上和地理上具有更紧密的关系;山东,则与韩国隔海相望。而香港地区与韩国均属“四小龙”之列,都有某些可资借鉴与利用的地方。浙江没有这种优势,但并未因此落后于以上三省,这又是为什么呢?

资源条件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西亚各国依靠石油资源迅速跻身于富国之林,就是一个证明。这些国家制度各异,科学技术亦不先进,但石油蕴藏丰富,在石油滚滚流出国门的同时,黄金也滚滚流进国库。这些国家虽然算不上现代化强国,但毕竟富甲天下,令人刮目相看。而我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资源总量相当可观,但一“人均”,便立即从高峰跌落下来。至于浙江,更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小省。在浙江,许多闻名遐迩的专业市场,原料并不产自当地,可他们就是在不多产羊毛的地方办起了羊毛衫市场,在不多产棉花的地方办起了轻纺市场,在不多产牛皮的地方办起了皮革市场,在不多产钢铁的地方办起了五金市场,在不多产木材的地方办起了三合板市场……。丰富的资源是令人羡慕的,可惜老天在这一方面对浙江过于吝啬。浙江不能仰仗上苍,那他们靠的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别的优势,大量增加资金投入也不失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遗憾的是,由于地处国防前哨的原因,国家不可能把大批工业项目摆在浙江。据统计,在改革开放前的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间,中央对浙江的投资额总共才77亿元,如果按人均计算,只有410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中央对浙江的投入也不多。综上所述,就发展的客观条件而言,浙江实在是鲜有什么可夸耀的了。

但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内因,外因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是不能完全找到浙江巨变的奥妙的,而如果我们把视角略作调整,把注意力移向经济发展的主体——人,特别是移向浙江人的精神层面,就豁然开朗:原来“奥妙”之中的重要“奥妙”不是别的,就是浙江区域文化的精华——浙江精神。

其实,只要人们不是直观地就事论事,就经济论经济,而是把世界上的事情联系起来去观察,并且努力透过事物的现象去把握隐藏于其后的本质,并不难发现浙江经济迅速发展的文化动因,只是过去没有加以提炼罢了。事实上,人们在实践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确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因素在对浙江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产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实践启示我们:文化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同时,经济建设也离不开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二、浙江的区域文化传统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制度因素相比,文化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却是要因素。韦伯的理论证明了这一点。不管韦伯是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他肯定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论点,却是持之有故的。

就全国而言,浙江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浙江文化既带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自己显著的地方特色。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浙江文化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善进取、急图利”的功利主义特色,洋溢着“崇尚柔慧、厚于滋味”的人文情怀,而且富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开拓冒险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千百年来,浙江先贤提出过许多经世致用的主张,形成了“义利并存”和“工商皆本”的学术传统。其中南宋以后兴起于浙东的事功学派表现尤为明显。事功学各派的学说虽不尽一致,但本质上有一个共同

点，即主张学术与事功相统一。他们反对离开功利而空谈道义，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功利与仁义并存”。在当时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盛行的社会氛围中，事功学派的务实精神确实是十分可贵的。此外，事功学派还明确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理论，主张“工商皆本”。这些思想既是对当时社会心态的概括与提炼，同时又受浸润于浙江民间的社会实践和思想观念。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从来都是互相影响的。上层文化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土壤，反过来，又对民间文化产生或大或小的作用和影响。两种文化长期交互作用，便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到了近代，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在给中国带来空前屈辱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对浙江上层文化的功利主义传统起了推波助澜的强化作用，客观上助长、催化了浙江人“讲功利”与“重工商”的文化精神。解放以后，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30年间，应当承认，上述观念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文化传统发生中断。所幸改革开放之后，浙江文化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又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延续下来，并且表现出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作用。世纪之交，当回顾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时，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有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力量，不仅确确实实存在着，而且对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人们把这种力量名之为“浙江精神”，并且概括成四句话：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应当说，这个概括是比较准确的。

三、精神是怎样变成物质的？

文化按其内部结构来说，以物质文化为外壳，向内深入依次为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文化层次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作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精神文化的作用虽然是潜移默化的，却是十分巨大的。

精神文化之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可分为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两种。直接作用即精神文化直接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行动的原动力,使人们萌生行动的欲望与决心,并排除影响行动的心理障碍。间接作用即首先以创新精神,造成一种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然后间接地带动经济的发展。浙江经济后来居上,不只是依赖浙江人的苦干实干精神,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

回顾浙江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精神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浙江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性格,使他们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得不怕困难、肯于吃苦、敢于向命运挑战。这是发展经济最需要的一种精神状态。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时代,浙江人在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深耕细作,把自己的家园经营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鱼米之乡。改革开放以后,浙江进入工业化初期,浙江人在资源贫乏、国家投入甚少的情况下,仍然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实干苦干,白手起家,发展乡镇企业。浙江的乡镇企业起步较早。越早,阻力就越大,困难就越多,于是,他们“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成了“气候”。在这一方面,温州人表现得尤其突出。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时代,温州人就尝试发展个私企业。但是,阻力重重,在很长的时间里,屡屡成为争议的焦点。温州人别无选择,只有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路。他们的成功是一曲自强精神的颂歌。

2. 浙江的重商传统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市场经济的“新事物”,因而能够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如鱼得水。在计划经济时代,毫无疑问,浙江人的商业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压抑的。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受压抑的意识苏醒了。浙江人行动起来,率先闯入市场经济的大海。他们或走南闯北,采购推销;或兴办市场,坐地买卖,绘出一幅“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生动图画。在很短的时间里,浙江的专业市场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发展起来,其数量之

多,规模之大,层次之高,堪称全国之冠。这种现象较早地出现在浙江,而不是别的地方,决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浙江精神之花在改革开放阳光雨露哺育下所结出的丰硕果实。

3. 勇于创新的品格使浙江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不断突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成为一个体制创新的“多发区”。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而在每一阶段,浙江似乎多着先鞭,表现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这样,浙江就始终保持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很显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既然体制因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么,一个地区在取得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之后,其经济发展“后来居上”便是必然的了。

4. 讲求实效的思维习惯,使浙江人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浙江人看来,“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论点,其正确性是无可争议的,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将之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据。他们到北方城市去做小生意,并不在乎职业的“低贱”,只要能挣到钱就行;他们曾经给个私企业戴上“集体”的红帽子,以求得必要的安全感;他们曾经干脆把股份合作企业宣布为集体企业,以免引起无谓的争议。总之,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干什么、怎么干都是可以的。重要的是实质,而不是名分。这种务实态度使浙江人受益良多。

凡此种种,不都是“精神变物质”的生动说明吗!

四、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升华

如前所述,浙江区域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浙江区域文化也不例外,它除了积极作用,还有自身的局限性。

浙江区域文化是千百年来的历史积淀而成的,虽然在当代中

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重新焕发生机，打上了一定的时代烙印，但它基本上仍然是属于历史的东西，属于传统文化。它是建设现代文化的重要“原料”，但不是现代文化的“成品”。

现代文化不仅需要现代知识，而且特别需要有现代观念。完全可以说，现代观念是现代文化的灵魂。传统文化只有经过加工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与现代知识熔为一炉，才能升华为现代文化。

浙江的区域文化基本上是在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孕育而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小生产的狭隘性和落后性，并且打上一定的封建性的烙印。例如，宗族意识在浙江经济起飞的初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民营企业开始起步的时候，为了筹措创业资金，节约管理成本，并且迅速形成企业的凝聚力，业主首先想到的便是借用亲友的力量。实际上，亲友关系的确提供了种种方便。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的作用日渐重要，科学管理也提上日程，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企业用人制度便成为提高企业绩效的障碍。这时候，企业只有突破传统的宗族观念，逐步走上用人惟贤和科学管理的规范化道路，才可以拓展生存的空间，从而继续得到发展。不然，宗族关系的作用就会走向反面。因此，我们既不能完全否认民营企业初始阶段“用人惟亲”的一定的“合理性”，也不能因为这一定的“合理性”而忽略其局限性。站在现代文化的高度俯视宗族观念，它毕竟是一种需要加以“扬弃”的东西。

传统文化的“糟粕”必须“扬弃”，就是对其“精华”，也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用世界眼光加以审视。这样，才能将浙江文化提高到适应于现代化潮流的境界。

浙江自古“人性柔慧”，其民处事精明是国人普遍感受到的。同时，又略感其“大气”不足。而干大事业是需要有一点“大气”的。手工业作坊式的小企业要向现代化大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要

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发展，市场从一地一国向世界拓展，都需要有战略的眼光与胆魄。小聪明不足以应对大局面，大局面需要大手笔。我们应当放开眼光，敞开胸怀，切不可过分计较小的得失，不可因小失大。若此，企业才能不断升级，事业才能不断发展。

浙江人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的精神使他们能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较快地富强起来。但富强起来之后，小农意识的基因却使他们很容易产生“小富即安”的心理，制约着很多人向生产的深度与广度进军。生存是人们创业的原动力，但创业的冲动决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个人生存的需要，也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个人对财富的无穷欲望。现代企业家必须超越自我，把企业的发展视为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并且以奉献社会为己任，以满足大众需求为最高宗旨。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家，尤其应当树立这种基本理念。

浙江人是有冒险精神的。在一定条件下，如在面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条条框框时，浙江人的冒险精神会表现为创新精神，这是浙江在改革开放中成为体制创新“多发区”的原因之一。但是，体制创新是有阶段性的，当一种新的规范确定下来以后，就需要人们去维护它和完善它。如果永远破字当头，新的规范是永远立不住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只有自觉地遵守市场的游戏规则，企业家才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所以，浙江企业要上新台阶，浙江的企业家就要自觉地把创新精神与法治观念统一起来。

浙江人有重商的传统，商业意识比较强，这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和适应市场经济。但一般来说，他们的商业意识是在小商品生产的环境中形成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形成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种新观念，如法治观念、人才观念、时间观念、质量观念等。这些观念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

综上所述，当我们着手探索“浙江现象”的奥妙时，首先想到了韦伯的理论：当我们循着韦伯的路径把视角移向文化时，则不仅

“发现”了浙江区域文化中确有多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而且“发现”了这些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机制”；而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些“机制”时，又“发现”了浙江区域文化的双重作用。于是，我们明确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升华”的重要性：只有经过这种“升华”，文化才能继续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目 录

绪论 弘扬浙江文化精神 再造新的辉煌·····	(1)
第一章 关于经济发展与文化之关联的理论反思·····	(1)
一、关于韦伯与韦伯命题的检讨·····	(1)
1. 韦伯命题的由来·····	(1)
2. 韦伯与韦伯命题·····	(2)
3.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5)
4. 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	(9)
二、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	(18)
第二章 浙江经济发展的初始文化背景·····	(25)
一、作为经济发展背景的浙江文化·····	(26)
二、浙江经济发展的文化储备·····	(29)
1. 浙江文化的区域归属·····	(29)
2. 浙江文化的地理依托·····	(30)
3. 浙江文化的斐然成就·····	(31)
三、浙江文化的独特气质与内在结构·····	(41)
1. 浙江文化的独特气质·····	(41)
2. 浙江文化的内在结构·····	(58)
四、浙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60)
1. 浙江的上层文化与经济发展·····	(60)
2. 浙江的民间文化与经济发展·····	(64)

第三章 文化因素与浙江经济体制变迁、经济绩效	(76)
一、浙江经济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	(78)
1. 诱致性的浙江经济体制变迁	(81)
2. 自主创新精神与浙江制度创新、经济增长	(86)
二、文化因素与浙江经济体制变迁路径	(95)
1. 现当代文化传统与浙江经济体制变迁路径	(97)
2. 古代文化传统与浙江经济体制演进路径	(102)
三、文化因素与浙江经济体制变迁中的经济绩效	(111)
1. 当代文化变迁与浙江体制创新中的经济绩效	(113)
2. 传统文化与浙江体制变迁中的经济绩效	(119)
第四章 温州与嘉兴——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差异比较	(141)
一、初始社会文化条件与温州经济发展	(142)
1. 温州经济发展的初始社会文化条件	(142)
2.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的发展	(150)
二、初始社会文化条件与嘉兴经济发展	(155)
1. 嘉兴经济发展的初始社会文化条件	(155)
2. 改革开放以来嘉兴经济的发展	(161)
三、比较与探析：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差异	(165)
1. 两地经济发展的差异性	(165)
2. 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74)
第五章 文化因素与浙江经济发展的矛盾及其超越	(189)
一、浙江区域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与局限	(190)
1. 浙江区域文化在改革探索阶段的作用	(191)
2. 浙江区域文化在经济体制全面转型阶段的作用	(203)
二、社会现代化与浙江文化和人的现代化	(216)
1.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	(216)
2. 浙江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223)
三、在现代化中促进浙江文化与人的进一步现代化	(229)

参考论著·····	(236)
后记·····	(241)

第一章 关于经济发展与文化之关联的理论反思

这是一本研究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关系的书，也就是说研究的是影响经济的文化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现代社会的兴起和经济的发展，最具启发性和理论意义的观点仍非韦伯莫属。正是韦伯首先发展出了一套从宗教精神、社会结构及文化、制度等多角度来分析问题的研究取向。因此本书的研究亦从韦伯开始。

一、关于韦伯与韦伯命题的检讨

韦伯生前关心的中心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亦即现代化的起源问题。韦伯将其称为世界文化史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几乎成了韦伯终生关注的学术课题。

1. 韦伯命题的由来

韦伯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韦伯的祖国——德国，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落后。因此“韦伯的全部问题意识都是从

德国大大落后于英法等欧洲的发达国家这种焦虑意识出发的”^①。

无独有偶的是，韦伯的问题意识同样也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重心。这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命运和国际处境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重新确立现代化的社会目标，韦伯的思想和理论也逐渐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视。

韦伯的观点通常被理解为从精神层面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他生前发表的最重要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对这一方面作了集中的阐述。一直到最近仍有人认为：“(韦伯)书中提出西方经过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尤其是英国的清教孕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随后的一系列比较宗教研究中，他进一步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因缺少一种类似的资本主义精神，使得近代资本主义在这些地区迟迟不能产生。”“韦伯学说之所以很有影响，是因为它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时，充分考虑了文化因素，或曰社会心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弥补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足。”^②等等。

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一个最鲜明的特征便是经济增长，亦即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韦伯命题很容易就被转化为文化精神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问题的讨论。我们的讨论也就从韦伯命题开始。

2. 韦伯与韦伯命题

韦伯命题通常有两种提法，一种认为韦伯命题，“简单地说，就是认为近代产业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是因其独特的原因而仅仅

① 甘阳：《韦伯研究再出发》，载《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三联书店1997年，第10页。

② 向荣：《文化变革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3期。